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蔡锷



一、少年英才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生于1882年12月18日。湖南是近代中国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曾涌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蔡锷就出生在湖南中部略偏西南的宝庆（今邵阳）县城东的亲睦乡。这里山青水秀，潺潺的流水、密密的林丛、巍峨的山岭，如画的风景区伴他度过幼年的时光。正像不平凡的人物大都是从平凡的家境中陶冶出来的一样，名垂青史的护国大将军蔡锷也是从旧中国一个极其普通和相当贫寒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蔡锷的祖辈世代务农，种田糊口，生计一向艰难。蔡锷的父亲蔡政原先也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勤奋好学的他在躬耕之余，还掌握了一些缝纫手艺和文化知识，兼以裁缝为业，经常到宝庆之西的武冈、洞口一带接点针线活，补贴家用。后来，因为他粗通文墨，又在黄家桥镇上办起了一所简陋的私塾，教授儿童，收取菲薄的学费维持全家生计。蔡锷兄妹5人，母亲王氏，除了在家照料他们之外，还要下地务农。生长在这样清贫的农村家庭的蔡锷，从小就得帮助父母做一些简单的农业劳动，因此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和生活节俭的习惯，这对他成年后的从政治军、保持廉洁简朴作风有一定的影响。

蔡锷6岁那年，为了让他学点文化，便于将来立身处世，蔡政让他进了自家私塾，亲自教授。小蔡锷聪颖异常，且沉静刻苦，所以进步很快。仅用三、四年，他就将“子曰”“诗云”之类的“四书”“五经”通读完毕。10岁时他已能写出比较流畅的文章，因而有“神童”之称。据说，小蔡锷有一次去小店买作文格纸，店主见他活泼伶俐，便想出条对联考考他。店主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上联，忽然看见作文格纸中缝间印有“三元及第”四个字，便信口说到：“小学生三元及第”，岂料小蔡锷应声对出“大老板四季发财”。听到这对仗工整的恭维话，店主心花怒放，当场免费赠送小蔡锷一叠作文格纸。从此，小蔡锷便以才思敏捷而闻名乡里。

小蔡锷虽有“神童”之称，但他不自恃聪明，学习相当勤奋刻苦。在湘西至今还流传着他童年时代勤奋好学的佳话。那时他白天帮家人做农活，晚上便点上油灯，常常独自读书学习到深夜。为了能多学一会儿，他瞒着父亲在灯碟里盛满油，等油燃完了才不得不睡下。蔡锷非常喜欢读书，但因为家贫，无钱买自己喜欢的书，所以每听到亲友有藏书，即便相距数十里，他也要翻山越岭去借阅。他不但乐于读书，还善于读书。他喜欢边读边亲手抄录，边写边记，因而能够深刻理解书中内容，能够融会贯通。

随着小蔡锷年龄的增长和学业上的突飞猛进，蔡锷的父亲渐渐地感到不能承担对儿子的教育了。为了使孩子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他便将儿子送到当地的一位知名学者樊锥的门下继续攻读。樊锥不但学识渊博，而且还是远近闻名的善于奖掖后进的学者。他免费收蔡锷为弟子，悉心加以教诲。在名师的指点下，蔡锷的学业进步更快，除先秦诸子之学外，他还

读了《孙子》、《吴子》、《司马法》之类的兵法书。

1895年春，正逢县里举行童生考试，13岁的蔡锷便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去应考。这次应试还传出了这样一段佳话：当考生们进入考场时，蔡政怕孩子太小中途挤丢了，索性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送进考场。监考的知识县看见这位可爱的小考生，好生奇怪，忙将蔡氏父子拦住，想当场试试。知县即景说了一句上联“子将父作马”。蔡锷连忙应声对答：“父愿子成龙”。知县对

蔡锷的敏捷才思既惊又喜，连连大声称赞道：“神童！神童！”。这次考试之后，蔡锷被补为县学生，考中了“秀才”。

就在蔡锷考中秀才的这一年，神州大地面临着—场新的震撼，腐败的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不仅侵占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而且还攫取了二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凡是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对清王朝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为救亡图存，纷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大批维新人士，积极倡导维新变法运动，希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民富国强。这时，湖南的维新派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新式学校——时务学堂，以谭嗣同为学堂总监，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由黄遵宪、唐才常等轮流教授，积极宣传维新变法主张。

1898年3月，年仅16岁的蔡锷，在湖南督学徐仁铸的亲自推荐下，来到长沙投考时务学堂，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为头班学生。从此，他不仅与恩师梁启超结下了终身不解的师生之缘，而且，在一大批知名维新人士的教诲、陶冶和影响下，学业和思想觉悟都得到了更大长进。蔡锷在头班的40名学生中年纪最小，但他通过认真学习和刻苦钻研，每月月考皆名列前茅，因而受到同学们的敬慕。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南学会的活动，常在《湘报》上发表文章，锋芒初露，引人注目，是梁启超门下的高材生。

湖南时务学堂倡导人人平等，形成了师生共同切磋、探求真理的学风。这在蔡锷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学校，每当与同学谈到当时的腐败政治，他总是声情激越。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他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报国志向，期待有朝一日，能像自己的导师梁启超、谭嗣同那样，在救国救民的运动中成为一名勇士。

二、求学东瀛

在腐败的清王朝的统治下，要在中国闯出一条革新救国之路是困难的。1898年秋，康有为、梁启超等在辅助光绪皇帝进行了历时103天的维新变法后，即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的镇压，这次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因此失败。谭嗣同等6人殉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也被解散。

求知心切的蔡锷，在愤疾、茫然和失望中，漂泊江汉，后来辗转来到上海，欲投考南洋公学。这时，在日本的梁启超已经得悉蔡锷等人行踪，于1899年7月来函召蔡锷等人东渡日本。在日本的唐才常又给他们寄来路费。于是，蔡锷和其他11位意气风发的同窗友好，便从上海启程，东渡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涯。

蔡锷到日本后，先进入梁启超和日本华侨共同创办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语，研究政治、哲学，补习普通学科，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耳目为之一新。学校的条件虽然简陋，但蔡锷十分珍惜时间和这难得的机会，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哲学著作。后来，蔡锷又进入了横滨的东亚商业学校，继续刻苦地探求新知。学校的生活尽管十分艰苦，但蔡锷在勤奋学习的同时，时刻不忘关注自己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积极投身于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加入了唐才常创立的“自立会”。

唐才常是维新改良派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他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后，又在

东京发展自立会成员并组织自立军，目的是“保国保种”。自立会与当时在海外策动革命的孙中山有紧密联系，企图联合当时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共同实现已破产的变法维新。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日俄等八国联军乘机发动了侵华战争，清政府内外交困。唐才常认为这是发动反清革命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决定返回祖国，在武汉成立自立军总部，策动武装起义。蔡锷与同学杨述堂、李虎等11人闻讯回国参加起义。由于起义的计划泄漏，准备不够充分，起义遭到了失败，唐才常等20多名志士被捕遇难。蔡锷因被派往湖南执行联络任务而幸免于难。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蔡锷得知唐才常和许多其他同学不幸殉难的消息，悲痛欲绝，恨不能也像同学一样壮烈捐躯。经过这一事变，蔡锷又一次目睹山河破碎、国势危亡的景况，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在东渡的船上，他挥笔赋诗，倾吐了自己的激愤心情：“拳军猛焰逼天高，灭祀由来不用刀。汉种无人创新国，致将庞鹿向西逃。”“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字里行间，凝结着蔡锷强烈的爱和恨，更抒发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无限希望。回到日本，他毅然决定将蔡良寅的名字改为蔡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未来的征途上，像锷刀那样光芒四射、锋利无比，为国为民，勇往直前。

同时，蔡锷对自己的前程作出了重要的抉择：投笔从戎，弃文习武，改学陆军，以实现自己“流血救民”的宏伟抱负。蔡锷向他的老师梁启超谈起了自己想改学军事的想法，征询老师的意见。梁启超看着蔡锷那文弱单薄的身子，不禁笑道：“你以一文弱书生，恐怕难以担当军事重任。”蔡锷坚决而自信地回答说：“今日讲救国，拿枪杆子比拿笔杆子重要，只须先生为我设法学得军事，将来不做一个有名的军人，不算先生门生。”梁启超见蔡锷习武之志如此坚定，不禁频频点头，表示首肯。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以私费进入东京陆军成城学校学习。

蔡锷是抱着“图强雪耻”、“流血救民”的志向而弃文学武的。在学习军事科学的同时，蔡锷一面关注着祖国的安危，一面悉心考察日本的政俗民情，了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目睹日本举国上下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的景象，蔡锷陷入了沉思：中日两国，同样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什么30年间却产生了一强一弱的巨大差距呢？思虑再三，他终于悟出了其关键在于“国体精神”的差异。一个善学西法，励精图治；一个则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作为“文明之祖邦”的中国，如果不在国体精神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很难由贫弱转为富强，走出落后挨打的困境。蔡锷进而认为，救国必须先从军事入手，先把握领导和训练国民的实权，再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法。

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蔡锷在课余之暇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活动。1902年，蔡锷追随黄兴等人，办起了《游学编译》杂志和湖南编译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宣传革命和民族独立思想。1903年，为了抗议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蔡锷与黄兴等人在留学生中发起并组织“拒俄义勇队”，进行定期训练，准备为国赴难。不久，拒俄义勇队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成为中国最早参加革命的学术团体。为了唤醒国人，蔡锷还积极发表革命文章。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5万字、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救国思想。

在《军国民篇》中，蔡锷首先回顾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失

败后的震颤、奋起及其结局。他痛心指出中国仍处于毫无生气的病弱状态。要改变这种“生气销沉”的局面，就要实行军国民主义。在蔡锷的心中，军国民主义就是发端于古希腊的斯巴达，而为近代各个列强所继承并加以发扬的“刚武不屈之气”和尚武精神。进而论述了中国之所以缺乏军国民主义而落下致弱的病根的八大原因。在蔡锷看来，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中国由弱变强的关键在于“陶铸国魂”，“建造军国民”，最后达到国家的富强。什么是“国魂”呢？他说：“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但是，蔡锷并没有指出中华民族的国魂是什么。

蔡锷的《军国民篇》是中国较早宣传军国民主义的文章，不仅在中国国内引人瞩目，而且在日本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章发表后，日本人下河边五郎曾将此文和蒋百里所写的《军国民之教育》一文，合编为《军事篇》一书，先后印行7版。蔡锷所宣传的军国民主义，是戊戌革新后呼吁改革声音的继续。蔡锷把军国民与国魂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国魂就是这一时期青年眼中的“祖国主义”，即提倡民主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蔡锷的军国民思想具有民主、爱国主义的内容。但是，无论“军国民”还是“国魂”，如果离开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这一根本问题，只是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那么，无论从军事入手，或者是从教育、科学入手，都是无济于事的。在20世纪初年，军国民主义虽然是爱国青年为了拯救祖国的一种呼声，然而却不可能真正地挽救中国的危机。

1903年1月，他还写了一封《致湖南绅士书》，向故乡父老恳切地汇报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和观感，并呼吁故乡有志之士“报国家而酬万民，御外族而结团体”，表示自己身处异域而心系祖国，时时“瞻望乡关”，“憾不能插翅鹏飞”，与祖国同胞共同担负改造中国的时代重任。

在日本留学的几年中，蔡锷由成城学校的预科生而至兵营的入伍生再至东京士官学校的骑兵科，这一系列的经历大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随着思想的进步和成熟，他终于觉悟到必须探索出一条新的救国道路，这就是要救亡图存，必须革命；要革命，就要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1904年11月，蔡锷从东京士官学校毕业了，在100多名毕业生中，他和蒋百里、张孝准的成绩名列前茅，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年底，归心似箭的他便身着戎装踏上了回国的航程。

三、弃学治军

1904年冬，蔡锷乘坐的邮轮开进了上海的黄浦江，上岸后，他立即与在上海的革命团体取得了联系，加入杨笃生、章士钊等人发起的“爱国协会”中去，并与黄兴等革命党人相互联络，待机策动起义。第二年春天，他回湖南省亲。闲暇之余，常登临岳麓之巅，面对湘江流水，赋诗明志。他的《登岳麓山》就抒发了精诚爱国的宏伟抱负：“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这首诗表明了这位青年爱国志士为了祖国安危、民族命运立志横刀跃马，搏击在时代漩涡的峰巅的决心。

蔡锷回国前后，正处各省掀起编练新军、创办军事学堂的热潮之际，急需懂得近代军事知识的人才。因此蔡锷刚一踏上国土，各省的聘书便纷至沓来。江西巡抚夏时首先聘请他担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负责培养当

地新式军事人才。1905年初，湖南巡抚端方为了罗致人才编新军，聘请蔡锷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当时的蔡锷，已经放弃了他老师梁启超的改良主张，积极赞成排除满清的革命。8月，广西巡抚李经羲又奏调蔡锷为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和总教习官，兼随营学堂总理官。蔡锷见李经羲对自己如此器重又如此诚恳，于是带领自己的学生雷飙等赴广西任职。到广西不久，又相继兼任新练常备军总教官、巡抚部院总参谋官，成为广西新军建设的核心人物。

广西地处南疆，防务重要，亟待建设，但广西又是一个财政支绌、人际关系复杂的省份。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在军事上作出重大的成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蔡锷到广西后，凭借自己的声名和才干，在开始阶段是一帆风顺的，他带去的学生也成为他左右的军事骨干，担任了学堂区队长或教官。然而，当蔡锷在广西军界声名鹊起之后，种种矛盾也就接踵而来，许多人冷眼旁观，蔡锷为此发出“孤掌难鸣”的叹息。

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举行规模盛大的新军会操，蔡锷奉令前去观操，并被派为中央评判官。这时，他本想借机辞去在广西的各职，但新任广西巡抚张鸣歧说什么也不同意蔡锷辞职。为了表示对蔡锷的信任，他又委派蔡锷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蔡锷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仍然兢兢业业地投身于广西的军政事业。

蔡锷在广西悉心考察和研究边境防务，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两部军事著作《越南重塞图说》和《桂边要塞图说》。1907年春，他陪同张鸣歧视察边防各地，巡行约4000余里，逐一记下了边关地区的山势和風土，并亲手草绘略图，还提出修建沿边炮台、整顿边防军备等建议，最后酝酿出关于加强广西防务的完整计划。除此之外，蔡锷在广西的重要活动是为当地培养军事人才。他在广西的主要职责就是训练新军。在担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时，更是对学生进行严格训练和严格要求。广西陆军小学共办了四期，先后毕业的学生有数百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后来名噪一时的人物，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创办陆军小学，是蔡锷回国初期所从事的军事活动中耗费精力最大的一项事业。陆军小学是培养陆军军官的预备学校，他认为陆军小学的学生都是有为的青年，是将来编练新军的骨干，决心尽全部心血将它办好，为军事救国培养人才。开办陆军小学时他只有26岁，但立志坚决，办事认真。他聘请的教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具有进步思想，德才兼优。陆军小学是当时的一流学堂，生活待遇优厚，投考陆军小学的条件十分严格。蔡锷不循私情，严格把关。据说李宗仁考上了第二期陆小，仅因为入学报到时迟了10分钟，即被取消了资格，延至第二年，考取了第三期，才得以入学。一位姓唐的学员由湖南来投靠第一期陆小，途中耽搁了十几天，误了考期。其父与蔡锷的父亲是世交，请求通融入学，但蔡锷坚持按规章制度办事，拒绝通融。由于蔡锷严格办学，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使广西陆军小学成绩斐然，名声大振。学生毕业后，多考入各地的陆军中学。

关于蔡锷在广西陆军小学任总办的情况，李宗仁回忆说：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敬若神明。蔡将军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身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几步时，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住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起来已够威风，而蔡将军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更

是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蔡锷为人处事一向比较沉着冷静，对重大问题，不轻易表态，也不任意行动，但广西政界军界的复杂情况，使蔡锷的工作进行颇为不易，也曾遭受挫折。1911年春，蔡锷受已调至云贵任总督的李经羲的聘请，启程赴滇，继续激流勇进，揭开了自己戎马生涯的新篇章。

四、云南革命

蔡锷来到云南以后，目睹云南人民革命情绪高涨、云南革命生机勃勃的形势，心情为之一振。

当时，由于英国于1910年公然派兵侵占滇缅边境的片马等地区，挑起事端，云南爱国军民奋起抗争，群情激愤。与此同时，云南当政者从留日的士官生中聘请了大批人员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职，这批教员中有许多是同盟会会员，或者是倾向革命的热血青年，这就为云南发动革命准备了人才和重要的活动场所。同盟会还在云南不断传播革命的种子，扩大革命的影响。

为了站稳脚跟，蔡锷与云南军政界的当权人物竭力周旋。在任新职之初，受云南第19镇统制钟麟同之托，编写一份向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文稿。于是蔡锷伏案著书，编成了一本颇有影响的兵书《曾胡治兵语录》。在书中，蔡锷分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12章，将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治兵格言，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整理，每章之前加按语，着重阐明这一章的主旨和它的现实效用，实际上是抒发蔡锷本人的治军思想。蔡锷编撰《曾胡治兵语录》的目的，是为了“厉兵秣马”，对付外国的侵略。此书1917年在上海出版后，对中国军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4年，蒋介石将此书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作为黄埔军校学员的军事教材。1943年八路军曾将这本书翻译成白话文，作为八路军将士的军事读物。蔡锷在此书中阐述的许多军事思想，是中国军事文库中的宝贵财富，对后来的新式军人的成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11年7月，蔡锷担任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后，开始按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进行新军的改造和训练工作。同时，更是想方设法同云南的革命势力保持联系。蔡锷任职的云南第19镇，由于大部分中下级军官都接受过讲武堂的训练，官兵的素质比较好，武器精良；而且军中弥漫着革命的情绪，军官中许多人是同盟会会员，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都参加了辛亥云南起义。在全国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第19镇的军官中的同盟会会员态度更加激进，活动越来越频繁。全国革命的形势和新军中酝酿的革命情绪感染和影响具有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蔡锷，蔡锷对革命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使他在云南中下层官兵中建立了威望。但是蔡锷仍然十分沉着，不露声色地等待着革命时机的到来。当时在蔡锷手下供职的朱德同志后来回忆说：“蔡锷虽不是同盟会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1911年10月10日，蔡锷盼望已久的革命时机终于来到了。辛亥武装起义在湖北武昌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昆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蔡锷参与了4次秘密会议，并审时度势，坚决主张迅速举旗。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参与会议的同志的赞同。在10月28

日深夜举行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10月30日深夜（即农历重阳节的晚上）发动起义，蔡锷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于是，蔡锷以总司令的身分，同大家最后商定了比较严密的暴动计划，对起义部队作了详细部署：蔡锷统帅37协所属步兵第74和73标，以及炮兵第19标为起义的主力。73标负责攻占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以军械局和五华山为主要目标；74标负责攻占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的地区，以巡防营、南门城楼、督署等为主要目标；炮标轰击目标为督署、五华山和军械局；讲武堂的学生则负责打开省城各个城门。此外，还规定了革命军的口令和标志。

10月30日晚8时许，昆明北较场73标第3营的官兵在抬子弹为起义作准备的时候，被北洋派的值日队官追究，群情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几个反动军官，于是起义提前几小时发动起来。73标的起义官兵立即攻破北门，进攻玉华山和军械局，并向其他起义部队举火为号。当时蔡锷正在昆明城外巫家坝的74标本部召集军官会议，部署起义的行动。会议还没有结束，只见昆明城内大火冲天，形势突变。蔡锷见形势发生变化，立即传令鸣号，集合74标和炮标军官，果断地宣布起义。蔡锷发布了进攻的命令后，为严肃军纪，临开拔之前，还明确规定：“各军不得妄杀一人，不得妄取民间一物，必须保护居民，防辑霄小。”再三叮嘱之后，蔡锷帅起义将士迅速向昆明城内跑步前进。

重九之夜，昆明的战斗异常激烈。云贵总督等企图顽抗，在城内层层设防，组织力量进行反扑，作困兽之斗。起义官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蔡锷率领起义军以强大的攻势，终于在午夜1时30分攻进了南门。进入省城之后，蔡锷在江南会馆设立起义军司令部，亲自指挥战斗，把矛头直接指向敌军盘踞的五华山和军械局等。战至第二天中午，起义军终于攻上昆明城内的制高点五华山，占领了总督署，重九起义宣告成功。在这场彻夜激战中，先后有150多名革命志士献出了生命，300多人负伤，以巨大的代价，迎来了胜利。

重九起义的成功，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昆明光复的第二天即11月1日，革命将士及各界代表在昆明五华山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组织成立了“大中华民国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起义军总司令蔡锷为云南军都督，负责云南的军政大计。蔡锷在一片欢呼声中，郑重地宣布了云南起义的宗旨以及军政府的施政纲领，声明云南起义的宗旨是“铲除专制政体，建设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国民权，恢张国力”。同时，云南军政府发表了《讨满洲檄》，重申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声明：“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可见，蔡锷是按照孙中山所制订的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从事云南的革命与建设的。

云南军都督府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省政权机构，组织上比较完备和稳定。在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各省政权中，是比较具有权威的。新的政权成立以后，没有出现过大的乱子，更没有出现其他地方发生的“政变”事件。省都督府内部机构的变化和官员的更替，都是通过正常的手续，或由会议决定，或由都督和有关部门任命。从蔡锷在这时期留下的诗中，可以看出他兴奋的心情：“东风吹彻万家烟，迎面湖光欲接天；千载功名尘与上，碧鸡金马自年年。”

蔡锷在成立了云南军都督府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带有民主色彩的改革。他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大到军政措施，小至规定商店

开门的时间，但其重点是改革内政、财政、教育和振兴实业。

改革内政，更新人事。为了根除封建专制恶习，倡导民主风气，切实提高行政效率，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共同协商筹划省内一切重大事宜；对全省的军政人员进行调整，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基本上换上了同盟会会员或在革命中做出贡献的进步人士；在军队中，也大胆任用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以改造和提高军队的素质。

整理财政，开源节流。财政的拮据是蔡锷治理云南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蔡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整顿厘税，废除陋规，确保厘税收入点滴入公。其次，开设富滇银行，保证纸币的信用和流通。第三，设立会计检查厅以监督全省的财政制度。此外，精简机关，遣散军队，蔡锷自己还曾两次带头减少薪金。

改良私塾，普及小学。蔡锷当政后，极力进行教育改革，以图改变云南教育落后的面貌。他下令为小学发掘经费，并劝导地方绅士，使他们明了教育的重要性。除大力兴办小学和初级师范学校外，还强调对青年进行外语教学，以培养高级人才。数年间，选拔了100多名优秀青年分送欧美及日本留学。

振兴实业，规划交通。蔡锷根据云南的特点，从振兴盐务和矿务入手，充分利用云南的自然资源，大力提倡农田水利和工艺制造事业，恢复和扩大生产，增加百姓收入。同时，针对云南交通闭塞的情况，对发展交通事业也作出了规划。

蔡锷执政云南期间，为治理滇省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采取了种种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体现了他励精图治的决心和蓬勃向上的活力。

五、援川援藏

蔡锷在云南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更关注着全国政局的发展，先后派遣大军援助四川等地，支援邻省的革命。

昆明重九起义后，云南全省旋即光复，蔡锷的军都督府迅速控制了全省。而同一时期，西南乃至全国，还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革命的发祥地武汉，革命军和清军正在激烈战斗，形势急迫。武汉的安危，关系到全国的大局；而地处武汉上游的四川能否稳定，又直接关系到武汉地区的战局。

四川的形势比较复杂。在武昌起义前夕，四川人民便开展了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的爱国保路运动，并迅速发展为反清武装暴动，奏响了辛亥革命的序曲。然而，武昌起义之后，四川响应起义的革命力量却在反动势力的严酷镇压和破坏下发生了分裂，到11月22日，同盟会才在重庆掀起暴动，成立了以张培爵、夏之时为首的蜀军军政府；但他们仅仅控制着川东和川南的部分地区，四川省会成都仍在清政府的手中。此后，川北广安、川东万县、川南泸州等地也先后宣告独立。四川军政府林立，社会秩序混乱。以四川总督赵尔丰等为首的清政府势力又屯重兵于川内，四川的形势十分危急。如果四川稳定，对武汉地区的革命将是一个巨大的支持。所以，解决好四川的问题，成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许多革命人士都把迅速解决四川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蔡锷身上。著名的革命党人黄兴、黎元洪，以及张培爵等四川军政界知名人士，都请求蔡锷派滇军援蜀。其实，这些要求正和蔡锷的愿望不谋而合。在云南光复之后，蔡锷

就曾想派兵北伐，支援武汉地区。他认为，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若让清政府得逞，挟其兵力财力，北连陕西、山西，东下武汉，则足以置国民革命于死地；所以，要北伐，必先保四川。1911年11月11日，云南军都督府讨论了“援蜀案”，旋即以军务总长韩建铎为师长组成了援川军一师，下辖两个梯团，分路进军四川。进军计划是第一梯团经叙府（今宜宾）进攻成都，打垮赵尔丰的军队；第二梯团经泸州向川东进击。

然而，当滇军先后抵达叙府和泸州时，四川的形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11月27日，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在资州被杀，同一天，赵尔丰在逃亡的途中又被击毙，成都成立了大汉军政府。12月8日，成都又发生兵变，形势非常复杂。蔡锷立即命部队“暂住叙泸，协商川中军府，镇慑地方，安抚人民，无庸前进，免起猜疑”。事实证明，蔡锷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滇军入川之时，就有人怀疑他们的意图，暗中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为了排除猜疑，蔡锷通电陈述滇军入川的动机，一面和成都军政府方面协商，以大局为重，妥善地解决了问题。由于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援川滇军于第二年3月返回了云南。

蔡锷派兵入川，主要目的是帮助四川荡平匪乱，恢复治安，抱着安定四川社会秩序、巩固反清成果的良好愿望，但他没有认清四川局势的复杂性，客观上造成了空耗兵力、延误北伐的后果。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屡遭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蔡锷从政云南以后，一直把加强西南防务，保卫边疆安全，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1912年6月，蔡锷组织滇军进行了抗击英国侵略西藏的战斗，表现了这位年轻的爱国将领的军事胆识和爱国精神。

辛亥革命前夕，英国和俄国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侵略活动，清政府曾派川军入藏，英国公然表示反对；西藏的三大领主也发动叛乱。1910年2月，川军在江孜粉碎了叛军的抵抗，进入拉萨，达赖在英国侵略者的唆使下逃往印度。武昌起义后，达赖与英国驻印度总督密谋，派人潜回拉萨策划武装叛乱。西藏大农奴主则组织“勤王军”，并以达赖的名义发布驱逐汉人的命令，围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的川军，进扰西康（今四川省内）的藏区，妄图将西藏从祖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蔡锷接到来自西藏的告急文书后，于1912年4月30日和5月6日两次急电四川和北京，呼吁中央政府和邻近的四川早作布置，恳切地表示云南不愿坐视西藏的危机，请求派兵出师西藏。5月29日，蔡锷致电北京，具体剖析了滇、川、藏边界的地理形势，提出了滇军进军拉萨的最佳路线，沿中缅边界，直取拉萨。但目光短浅的袁世凯没能同意蔡锷的计划。

接到北京政府要滇军从巴塘进军西藏的电令后，蔡锷任命都督府参谋厅总长殷承献为滇军西征司令官，率兵进藏。8月15日，滇军西征军左纵队与西藏叛兵相遇于溜筒江附近，该地叛军依险据守，滇军发起进攻，打死打伤叛军70余人，滇军无一人伤亡。叛军逃到江的对岸，砍断江上的溜索，企图阻止滇军前进。滇军派人在江面上急架溜索，命四个排溜渡过江，占领了对岸的军事要地。19日，滇军抵达丽江，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于26日夜突袭占据盐井的叛军，收复盐井。

攻克盐井之后，本应乘胜追击，但滇军的胜利又引起了川军的猜疑，四川都督尹昌衡前后三次发电，阻止滇军前进。袁世凯又电令滇军回师，致使平叛作战半途而废。蔡锷赴西藏平乱的宏伟计划，终遭搁浅。但是，蔡锷在

祖国统一遭到破坏的时候，挺身而出，抵御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镇压叛乱分子，他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六、奉调进京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蔡锷热烈欢呼中华民国的诞生。可是，到了3月，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却玩弄手腕，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孙中山被迫辞职，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时，蔡锷以为“国权”已经统一，并为袁世凯的“民主共和”的外衣所迷惑，对袁世凯抱着极大的希望和幻想，甚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支持袁世凯。例如，当袁世凯窃踞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为了维护共和制度，约束袁世凯的专断独裁，企图迫使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而袁世凯不愿离开自己的北洋老巢，坚持在北京建都，这样便发生了一场关于建都北京还是南京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蔡锷两次通电全国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认为“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蔡锷有感于内忧外患的煎迫，迫切希望看到一个国家统一、人民富强的中国。他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加强“国权”，以对付虎视眈眈的外国侵略者。因而，他对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不切实际地抱着莫大的企望。在袁世凯公开恢复帝制活动之前，蔡锷对袁世凯一直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基本的政治态度也是倾向于袁世凯的。

1913年3月，在新的国会召开之前，袁世凯派特务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妄图建立独裁统治。4月，又与英、法、德、俄、日5国银行团签定借款协议，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从日本回到国内，竭力主张武装讨袁。袁世凯得到这一情报，先发制人，派兵南下。国民党人被迫起兵，组织讨袁军。黄兴在江苏南京被推为江苏讨袁总司令，其后，江西、广东、上海、安徽、福建、四川等先后宣布独立。这时，蔡锷内心矛盾重重，尽管他口头上宣称保持“中立不偏”的态度，主张“两方休兵，凭法理解决”，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袁世凯的。因为在他看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是合理合法的，是中国统一的象征；中华民国才成立1年多，全国统一的局面来之不易，应该加以珍惜。对袁世凯的心怀叵测、倒行逆施、不断地挖人民用生命和鲜血铸成的共和国的根基这一切，蔡锷是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的。袁世凯有一个暴露的过程，蔡锷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蔡锷仍然在思考，在探索。

1913年9月，蔡锷奉调赴京。他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绕道越南河内，经香港和上海，于10月4日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这时，名震全中国的蔡锷只有31岁。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这时，袁世凯正在导演着一场强令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的丑剧。他强迫宪法会议通过《大总统选举法》，派军警包围国会，要挟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又公开承认英、俄、法等13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0月10日，袁世凯和黎元洪公然在太和殿正式就任正副总统。接着，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消国会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北京城里笼罩着袁世凯独裁、专横的妖雾。

蔡锷一到北京，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表面上对他处处表现得敬重、殷勤，

实际上，袁世凯调蔡锷入京，使的是调虎离山计。尽管蔡锷还没有反对过他，但为人奸诈的袁世凯仍然对蔡锷存有戒心和猜疑。他曾对人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有所防范，所以调他来京。所以，袁世凯表面上是热情笼络，暗地里是严加防范。袁世凯任命蔡锷为陆军部编练处副总裁，并加昭威将军头衔，随后，又任以全国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政治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等要职，这些头衔只是徒有其名，基本上没有实权。

蔡锷对袁世凯委以的职务还是比较热心的，他尤其热心于军事教育。他不仅与一些留日归来的年轻军官组织军事研究会，讨论和演讲各种军事问题军事计划，还请外国军事专家讲演，图谋改进军事教育和提高军事学术水平。蔡锷对军事学术素有研究，他还利用这段时间，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作为呈献给袁世凯的国防计划的纲要。蔡锷对自己的工作总是采取一贯的兢兢业业的态度，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但是，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蔡锷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5月，废除了孙中山南京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而代之以其御用机构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取消了责任内阁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点点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被袁世凯统统砍掉了，剩下的只是一块“民国”的招牌。就是这块招牌，袁世凯也觉得刺眼，非把它扔掉不可。对内独裁的同时，袁世凯对外还进行了大量的卖国活动。为了实现其当总统、当皇帝的野心，他把国家主权和祖国的大好河山当做礼品，奉献给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据不完全统计，在袁世凯当政的几年内，先后和俄、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100多个不平等条约。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因忙于西方战事，唯恐已霸占的胶州湾被日本等国夺去，就表示愿意把胶州湾归还中国。蔡锷认真分析了战争形势，认为德国这样做是迫不得已，而对中国来说则是机不可失，于是多次建议袁世凯派兵驻守胶州湾，以遏止日本军队的入侵。但袁世凯并未采纳蔡锷的主张，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山东，占领德国租借的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各地。蔡锷在日本出兵之后，又向袁提出派兵到山东与日本交战的要求，袁世凯仍然置之不理。日本对山东实行军事侵略之后，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无理要求，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提出的无理条件和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的广大地区和中国政府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蔡锷对这个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感到异常痛心，他在一次参议院会议上，发表了1个多小时的演说，竭力反对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主张要有最后作战的决心和准备。中日双方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袁世凯政府终于在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条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和反抗，各地群众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具有民主爱国思想的蔡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对袁世凯的幻想也被铁一般的事实所粉碎。他开始从幻想中清醒过来，走上反对袁世凯的道路。

七、智脱虎口

袁世凯野心勃勃，蓄谋复辟帝制。他对内搞独裁，对外卖国，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都是为达到登上皇帝的宝座这一目的服务的。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认为自己登基做皇帝的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授意参政院参政杨度等，发起组建“筹安会”，以学术研究为名，宣传君主制比民主制优越的谬论，公开策划恢复帝制的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的问题。袁世凯的复辟行动一公开，广大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一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蔡锷对袁世凯的复辟行径是无法容忍的，他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就匆匆赶到在天津的老师梁启超处。这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看到袁世凯的帝制活动越演越烈，已经一反过去拥袁的主张，公开反对袁世凯；梁启超跑到天津，在津京各大日报发表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宣布与袁世凯决裂。梁启超和蔡锷的政治态度是相互影响的，他们积极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决定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以云南、贵州为基地，在适当的时机发动军事讨袁。之所以选定云南和贵州为讨袁基地，是因为这些地方原是蔡锷的势力范围，许多军官经过辛亥革命的战斗洗礼，觉悟较高；士兵的战斗力也比较强；而且云、贵远离北京，袁世凯政府的影响较小，鞭长莫及，难以控制。由于受到袁世凯的镇压，一些著名的国民党人逃亡海外，留在国内的军人大多被袁世凯收买，蔡锷决定由自己担当起讨袁的重任，以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华民国。此后，他差不多每周都要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

但是，蔡锷在暗中进行反袁活动的同时，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蔡锷和梁启超的亲密的师生情谊是人所共知的，当梁启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反袁以后，蔡锷作为梁启超最亲密的学生，他的行动开始受到袁世凯及其爪牙的监视。蔡锷为了蒙蔽袁世凯，故意在北京到处对人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表面上与梁启超“划清界限”。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一面派出密探监视蔡锷的行动，一面故意寻找时机对蔡锷进行考验。袁世凯时常借故找蔡锷问话，蔡锷只得处处小心。他有时谦虚地表白自己年纪轻、阅历浅，不识大体，不知世故；有时又故意一问三不知，词不达意。袁世凯对他还是不放心的，认为蔡锷是故意作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样子。1915年10月4日早上，蔡锷的住所突然闯入了八、九个歹徒，他们手提手枪，翻箱倒柜，搜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有搜到，便扬长而去。这些袁世凯派来的特务，企图在蔡宅搜出有关蔡锷和梁启超联合反对袁世凯的证据，但蔡锷早有准备，已经把密码本等转移到了天津，让这些特务扑了个空。事后，蔡锷打电话质问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雷只是连声说：“误会，误会！对不起，对不起！”袁世凯对蔡锷的这一突击抄家，震动了朝野。蔡锷尽管义愤填膺，但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忍气吞声。袁世凯没有搜到什么证据，又走漏了风声，气急败坏，于是故作姿态，令警察当局捕拿歹徒，算是对蔡锷的抚慰。

正是在这一时期，蔡锷一改以往一贯的严肃的生活作风，开始涉足京城的一些声色犬马之地，装出无所作为的样子。蔡锷为了日后方便地逃离京城，解除后顾之忧，借故和夫人刘氏大吵大闹，砸甩家什，闹得满城风雨，甚至还惊动了袁世凯。由于蔡锷和夫人吵闹不休，蔡夫人借此带着母亲和孩子回湖南去了。蔡锷家眷离开北京之后，袁世凯觉得事情不妙，更加紧了对蔡锷

的戒备。袁世凯登基称帝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形势迫人，蔡锷决定尽快逃出北京。

为了顺利地逃出北京，蔡锷煞费苦心，作了十分谨慎周密的安排。临行之前，他先是和一班朋友彻夜打牌赌博，麻痹那些密探以躲过监视。然后，一大清早，他就上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签到。在平常，蔡锷一般是上午11点到办事处签到，这天，他把手表往前拨了两小时，赶到办事处。由于办公时间还没到，值班员看到蔡锷诧异地说：“将军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蔡锷故意把自己的手表和办公室的时钟对了对，说：“我的表错了，可能是晚上停了，既然来了，先签个到吧。”他在办公室踱来踱去，又打了个电话给熟人，约好中午在某某地方等他一起吃饭，然后，他离开办公室，直奔火车站，乘车逃往天津。

蔡锷到天津后，住进日本人办的共立医院，向袁世凯称病请假，同时，加紧与孙中山、黄兴一派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时，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聚集的大批革命党人几乎都派人与蔡锷进行了接触。蔡锷在天津与梁启超商定，由梁先去广东和广西，并派人到云南通知蔡锷即将回滇的消息，蔡锷则转道日本，秘密赴云南。

12月初的一个深夜，寒风凛冽，蔡锷改名换姓，手提简单的行李，登上了日本商船“山东”丸，东渡日本。行前，蔡锷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请假赴日本医治喉疼等症。袁世凯接信后知道大事不妙，急电催促蔡锷返京，但这时蔡锷已经东渡日本了。蔡锷到东京后，与前来迎接的革命党人张孝准等商议，决定与石陶钧互换服装，让石携带自己的行李去箱根，假装就医；自己则秘密赶往横滨。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亲笔信件，请在日本的朋友隔几日寄一封给袁世凯身边的高级官员。这些信大多是介绍蔡锷在日本的游历情况和养病的情形。后来，当蔡锷已经回到昆明时，这些信还没有寄完呢！所以，袁世凯后来得知蔡锷已经回到云南的消息时，大吃一惊，还不愿相信呢。

蔡锷在日本不顾旅途的劳累，处理好一些具体的事务后，改乘另一艘日本船经上海吴淞口转赴香港，取道越南河内，一路经过许多艰难险阻，躲过袁世凯的爪牙的追杀，终于在12月19日抵达昆明。

八、护国讨袁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导演的复辟帝制的活动达到了高潮。继组建筹安会之后，袁的爪牙、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又组织了什么“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立即恢复帝制。在他们的鼓动和收买下，一时间，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请愿团”闻风而起，演出了一幕幕令人作呕的闹剧，当时甚至还成立了什么“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纷纷上书，要袁世凯当皇帝。紧接着，袁世凯装作尊重“民意”的样子，授意参议院迅速征求国民的“公意”。参议院立即炮制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3天之内，全国共选出1993名代表，进行所谓的“国体投票”。投票结果，1993名代表全部同意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实行君主制，义由各省的“国民代表大会”写出了内容完全相同的“拥戴书”，恭敬地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于是，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制，摇身一变，当起“中华帝国”的“皇帝”来，接着又明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全过程。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恨。蔡锷等在云南首先对袁

世凯发出通电，宣布进行护国起义，打响了护国讨袁的第一枪。

蔡锷之所以选定在云南发动讨袁护国的起义，与云南当时的革命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蔡锷回到云南之前，云南已经在酝酿着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进行得正热闹的时候，滇军中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如邓泰中、董鸿勋、罗佩金等已经在策划发动讨袁。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派出了密使前往云南积极活动。尽管云南地处边陲，但云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滇军中的军官，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背叛“共和”，极为不满。蔡锷在云南当政3年，滇军中的许多军官与蔡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军事实力上说，尽管滇军人数只有袁世凯军队的十分之一，但是云南陆军素质较好，军械大部分为德国制造，枪炮火力较强，因而曾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说。云南当政的唐继尧等，许多是前同盟会员或倾向革命的人，具有一定的民主共和思想，加之受到梁启超和蔡锷的影响、鼓动和催促，他们反对帝制的态度越来越明朗。当蔡锷回到昆明的时候，云南的反袁斗争已到一触即发之际。

蔡锷从北京回到昆明的消息很快就在滇军和昆明的老百姓中间传开了，几天前的人心浮动的情形大为改善。蔡锷回来之前，昆明气氛紧张，谣言四起，老百姓对讨袁之战存有疑虑，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粮食也突然涨价。蔡锷回来之后，与唐继尧坦诚相交，互相在反袁的思想很快取得一致，老百姓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米价也开始下跌。老百姓对蔡锷充满了信任，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12月21、22日，滇军上校以上军官、省级各机关长官以及其他爱国反袁志士，在蔡锷和唐继尧的召集下在都督府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的第二天，有个别军官害怕袁世凯的力量，觉得以这样少的军队去讨袁是以卵击石，有畏惧情绪。蔡锷同大家耐心地回顾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形势，分析人心向背，指出反对帝制的人在十之八九，袁世凯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小。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兴师讨袁，所争者为我四万万同胞的人格，而绝非个人权力地位之私。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他相信：“反对复辟，一定成功！”会场上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大家举手宣誓：“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为了旗帜鲜明地突出讨袁军队的护国性质，蔡锷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采用中华民国护国军这一名称。

12月23日，蔡锷等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云南巡抚任可澄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并责令袁世凯于24日上午10时答复，以此拉开了反袁斗争的序幕。同一天，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李烈钧等又照录此电，联名电知各省。第二天，蔡锷等再次致电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12月25日，蔡锷和唐继尧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庄严宣告云南独立，讨伐袁世凯，并宣布蔡锷为讨袁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护国军云南都督。消息传出之后，昆明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全市各界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的口号，全城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至此，轰轰烈烈的护国讨袁战斗打响了。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举行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19大罪状，昆明人民喜气洋洋，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几天就达五、六千人。

1月14日，蔡锷亲自率领护国军主力中路军，从昆明向川南进发。护国军有着严明的军纪和军风，要求士兵“一律严守军纪，保持秩序，勿失严整”；不得“乱入民家”；“购买须得公平，不得依势估压”；“官长须要身先士卒，为部下之表率”。蔡锷素来生活简朴，行军途中，他和战士们同甘共苦，风餐露宿，自己背着饭盒，用树枝作筷子，伙食非常简单。这样的正义之师，这样良好的军纪，使得蔡锷的部队沿途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蔡锷因长期为国事操劳，四处奔波，积劳成疾。尽管当时他只有34岁，但身体已经显得十分虚弱。特别是在北方时染下的喉疾，由于在昆明策划反袁事宜，一直没能好好诊断医治，时好时坏，有时声音微弱得说不出话来。据朱德同志后来回忆，当朱德遵照蔡锷的计划率领士兵驱逐帝制派军官宣布起义后，赶到蔡锷的司令部报到时，看到蔡锷“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在闪闪发光。结核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我们坐下来后，他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的计划，并说云南必须挑起重担，等待其他各省共和派力量组织起来。”听完蔡锷的报告，朱德关切地劝蔡锷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再带队出征了，但是蔡锷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已经不多，找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他不顾自己的疾病和大家的劝告，置自己的病痛生死于不顾，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讨国贼的征途。

尽管蔡锷拖着病痛的身躯，但他仍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昂扬的斗志。他在行军途中赋诗道：“蜀道崎岖也可行，人心奸险最难平。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蔡锷率讨袁大军北进，直指川黔边界，道路越来越崎岖，寒冬腊月，气候也越来越坏。当蔡锷率中路军抵达川黔边界的雪山关时，阴云密布，大雪纷飞。第二天一早雪停后，蔡锷立马关口，遥望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崇山峻岭银装素裹，不禁心潮汹涌，豪情横溢，兴致勃勃地撰写了一副对联：“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这气势磅礴的长联，抒发了蔡锷非凡的胆略和宽广的胸怀。后人将这副对联刻在雪山关两侧的石柱上，以纪念这位护国英雄。

九、泸纳战役

蔡锷挥师北上，其主攻方向是四川泸州。早在蔡锷率领大部队离开昆明之前，护国军左翼军第一梯团在团长刘云峰的带领下，已经进入滇川交界的新场地方，准备攻占叙州。

第一梯团到达新场时，新场及其附近的燕子坡、黄坡耳和捧印村等地已经被北洋军伍祥桢占领，到处都有重兵把守。1月17日晨，护国军和敌军在新场和燕子坡展开激战。护国军士气旺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势如破竹，先后占领了燕子坡、黄坡耳等地，并继续挥师北进，所向披靡，打得敌人溃不成军，4天后攻克了川南重镇叙州。护国军首战告捷，袁世凯气急败坏，下令伍祥桢戴罪立功，反攻叙州。四川将军陈宦悬赏50万元，调兵四路围困叙州。叙州人民踊跃参加战斗，自动组织义勇军配合护国军的正面进攻，他们潜至敌后，为护国军作引导，袭击敌人的炮兵阵地。护国军奋勇冲杀，敌人腹背受敌，一片混乱，敌军纷纷逃窜。接着护国军又先后粉碎了敌军从东、

南、西各个方向的进攻，陈宦想四路攻克叙州的计划未能得逞。后来因为蔡锷所率的第二和第三梯团准备攻打纳溪、泸州，但兵力单薄，调刘云峰的部队增援。留守叙州的护国军总共只有四、五百人，在敌军的夹攻下，寡不敌众，退出叙州，北洋军冯玉祥的部队趁机进驻叙州。冯玉祥在镇压护国军的过程中，眼见全国人民的反袁浪潮越来越高，而冯玉祥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也有所不满，于是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对袁世凯催促他进攻的命令推三阻四，暗中与蔡锷取得联系，所以，在叙州附近，北洋军和护国军实际上处于休战状态。

1月26日，蔡锷率领的赵又新第二梯团和顾品珍第三梯团抵达贵州毕节。蔡愕命董鸿勋与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联系，秘密商定刘军策应护国军的办法。刘存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云南讲武学堂的教官，辛亥革命时参加云南重九起义。与蔡锷联系密切。董鸿勋将蔡锷准备攻打泸州的消息向他通报，以求配合、支援。董鸿勋支队于1月31日到达四川永宁，2月2日，刘存厚在与泸州一江之隔的纳溪宣布独立，2月4日董鸿勋的队伍与刘存厚在纳溪会师，从而拉开了决定护国战争命运的、打得极为艰苦和激烈的泸（州）纳（溪）之战的序幕。

在泸州方面，北洋军曹錕已经聚集了张敬尧一师、吴佩孚一旅和川军熊祥生旅，死守泸州，总兵力约1.5万人，装备齐全，士兵的战斗力的较强。而蔡锷的中路主军人数只有3130人，刘存厚师约1500人，再加上川边义勇军张煦支队约900人，总共仅5000余人。为了完成从泸州突破的计划，蔡锷不得不抽调西面刘云峰的兵力前来增援助战。

2月5日，董鸿勋和刘存厚的部队合力进攻泸州对面的蓝田坝和月亮岩。月亮岩雄峙长江，如果占据它，可以在上面布置炮兵，居高临下地俯击泸州。2月7日，护国军攻下了月亮岩并把它和蓝田坝一起交刘存厚部的陈礼门团驻守，阻止敌人渡江。董鸿勋不等主力部队到达，自己率两个营的兵力从下游的泰安场渡江，攻击泸州的侧背，占领了泸州郊外的军事要地五峰顶等，眼见泸州指日便可攻破。但是，由于驻守月亮岩的陈礼门麻痹大意，放任士兵赌博，9日，驻泸敌军熊祥生旅一面死守泸州城，一面利用夜幕偷渡长江，突袭月亮岩，使守军猝不及防，惊惧溃逃，陈礼门羞愤自杀。董鸿勋得知月亮岩失守，恐自己孤军深入而遭不测，只好退回纳溪。12日，泸州的敌军倾巢而出，渡过长江，把董鸿勋和刘存厚包围在纳溪富安街一隅，形势十分危急。13日晚，何海清支队赶到纳溪并立即投入了战斗，蔡锷又紧急电令其他各部支援，总参谋长罗佩金率禄国藩和朱德支队也赶赴纳溪前线，攻克泸州的战斗演变成了保卫纳溪的战役。

战斗开始，双方的炮火都异常猛烈，昼夜不息，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朱德这时接替了董鸿勋的第六支队长的职务，担负起对敌作战的最艰巨的任务。他忠于职守，机智勇敢，指挥有方，与敌军在棉花坡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棉花坡是纳溪通向泸州的咽喉要地，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敌军在那里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凭借险要地势，死守，战斗陷入胶着状态。棉花坡一战是护国军泸纳之战的最重要的阶段，双方在此相峙了近1个月，战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对全国各地的影响时间最长；护国军的英勇顽强，在阵地战中处于不败的地位，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对全国的号召作用也最大；敌人在此役中兵力损伤很大，元气大伤。当时，北洋军依仗枪械多弹药足，昼夜不停地向护国军阵地倾泄炮弹，连阵地前后的松林都被击倒了大半，毁

落在地上的松针达几寸厚。但护国军将士们在枪林弹雨面前没有退缩，表现出为正义而战的大无畏精神。

蔡锷看到曹锟的军队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双方相峙在棉花坡，而敌军的工事坚固，负隅顽抗，护国军处于向上仰攻的形势，胜败难分。为了击破北洋军的进攻，蔡锷指挥全军分三路向敌军反击。2月23日，蔡锷不顾自己身体虚弱，带病从设在永宁的总司令部奔赴纳溪，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将士们得知蔡锷来到前线，士气大振，勇猛杀敌。蔡锷到纳溪后，与总参谋长罗佩金日夜筹划，准备大反攻。反攻前夕，蔡锷身着士兵服到前线巡视，午后经过朝阳观敌军阵前时，行进间被敌军发现，敌机枪猛烈扫射，弹密如雨，蔡锷进退两难，不得不和军士一起从田埂滚入水田隐蔽，在水深及胸的水田中躲到天黑，才爬上田埂回到指挥部。即使在这样的艰难险境，蔡锷仍然保持着革命的豪情，他在诗中写道：“绝壁荒山二月寒，风尖如刃月如丸。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

经过几天的修整和部署，蔡锷在2月28日命令发起总反攻，反攻的主攻部队是何海清支队，朱德、王秉钧支队和刘存厚部作为助攻部队。反攻开始以后，护国军冒着绵绵的细雨，在绵亘20余里的战线上，与敌军连续激战了几天几夜，多次与敌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朱德在回忆这场战役时说：“川南全部化为战场，一连激战了45个日日夜夜，毫无间歇。”蔡锷也曾说：“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在这次战役中，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由于战事旷日持久，部队官兵过于疲劳，而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源源不断地到来，护国军却无援兵可供补充，军需、弹药也快要用尽。蔡锷在前线多次呼吁请求增援，却没有得到应有响应，只好采纳罗佩金、刘存厚等人的意见，于3月7日凌晨分左、中、右三路撤出纳溪。此次撤退，并不是溃败而退，而是有计划的周密的行动。当队伍开始撤退时，敌军用猛烈的炮火进行轰击，炮弹落在蔡锷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周围，弹片纷飞，炮声震耳，蔡锷却泰然自若，坚持指挥部队有条不紊地撤退，直到护国军全部撤出纳溪，他和司令部的成员才缓缓离开。蔡锷的司令部行营撤至永宁大洲驿，司令部就设在永宁河边的一条船上。

这次战斗历时较长，蔡锷虽然身患重病，但却始终坚持战斗，和士兵们一起日夜寝食于风雨之中，出生入死。尽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护国军人数有限，以劳攻逸，地势不利，但是军中士气坚定，上下一心。尽管伤亡惨重，并没有削弱将士的斗志，士兵勇猛顽强，以一当十，所以虽然屡涉险境，都能够绝处逢生。蔡锷退驻大洲驿后，疾病日趋加重，两个星期喉病重得不能发音，每到夜间，喉间痒痛，随后剧烈地咳嗽。这时，敌我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蔡锷才得以利用这么一点空隙休养一下。

1916年2、3月间，正当蔡锷指挥护国军与北洋军在川南激战时，梁启超积极策动广西起义，以减轻北洋军对四川的压力，支援蔡锷的护国战争。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在柳州行营正式通电全国，宣布广西独立，以广西都督的名义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接着，出兵广东和湖南，将护国战争向东扩大了。广西的独立对正在四川艰苦作战的蔡锷和护国军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经过一段时间整顿队伍，休养兵力，蔡锷抓住广西独立的大好时机，于3月17日下达了总反攻令。护国军从几路发动进攻，连战告捷，一举拿下了江安、南溪等地，兵临纳溪城下，直逼北洋军张敬尧的大本营泸州。护国军

在这次出击中乘胜追击，敌人的精锐部队遭到重创，元气大伤，不得不和护国军停战议和。

蔡锷等人掀起的护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敲响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丧钟。袁世凯原定的在 1916 年元旦的登基大典也没能如期进行，一再拖延。眼见全国的反袁风潮越演越烈，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也与他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了，他们暗中和蔡锷、唐继尧等人互通情报；帝国主义各国也在袁世凯的江山摇摇欲坠的时候改变了态度，多次对袁世凯政府提出警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迫使袁世凯于 3 月 22 日下令撤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这样，他做了 102 天的皇帝梦成了泡影。

十、逼袁退位

袁世凯出于无奈取消了帝制，但他仍然想力图保住自己的大总统的职位。他在撤消帝制的申令中，已经以“本大总统”的名义发号施令了，“本大总统”这几个字是袁世凯亲自加上去的。这是他“点睛传神”之笔。3 月 25 日，袁世凯以黎元洪、段祺瑞和徐世昌的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和陆荣廷等，称大家取消帝制的目的已经达到，可以停止干戈，一起进行善后工作了，同时又命令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谈判停战事宜。4 月 6 日，袁世凯又向护国军提出了 6 项议和条件：（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派驻战地的所有兵士退回原驻地点；（五）三省官兵从即日起不再和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一个代表来京，筹商善后事宜。这显然不是什么议和条件，而是以战胜者的姿态图谋解除护国军的武装，施以缓兵之计，以便日后卷土重来。这种条件护国军方面当然是不会接受的，蔡锷不为窃国大盗的阴谋所动，决心将护国战争进行到底，迫使袁世凯退出政治舞台。

针对袁世凯的 6 项条件，蔡锷和唐继尧等立即发出通电，拒绝承认袁世凯的总统地位，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 6 条议和条件：（一）袁世凯立即退位，可以免于死，但必须逐出国外；（二）诛除帝制祸首杨度等 13 人以谢天下；（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 6000 万元，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的财产加以赔偿；（四）袁氏子孙三世均应剥夺公民权；（五）按照约法，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所有文武官员一律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的指令。

不仅是护国军决心反对袁世凯继续担任总统，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也在继续进行。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坚决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再次发表了《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以爱国主义的精神，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各省的国民党人奋起响应，全国各阶层人民亦纷纷声讨，形成了对袁世凯的强大舆论攻势。4 月 6 日，袁世凯的爪牙、广东将军龙济光在梁启超等的苦劝下，为形势所迫，宣布广东独立；4 月 12 日，浙江也宣布独立。袁世凯企图作最后的挣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拉拢北洋势力，组织“战时内阁”，准备以武力打开新局面。

蔡锷清醒地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他在要求袁世凯下台的同时，又呼吁继续作好战争的准备，不要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护国军以及反袁独立的几省为了对抗袁世凯及其独裁政权，联合南方各省的反袁力量，积极筹建统一的机构，以便处理军政大事。5 月 8 日，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护

国军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蔡锷、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刘显世、岑春煊、李烈钧等为军务院抚军，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以后，发表宣言，取消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军务院的成立表明了护国军袁退位的决心，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信心，对形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全国范围内反袁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袁世凯的一些心腹和爪牙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改变对袁世凯的态度。5月9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驱逐了陕西将军陆建章，自任陕西都督；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慑于军民的要求，不得不宣布四川“独立”，同时“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5月29日湖南将军汤芑铭也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在一片众叛亲离声中，垂头丧气，从此一病不起。6月6日，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终于一命呜呼了。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卖国求荣，企图复辟帝制，最后落得个历史罪人的下场，为世人所不齿。蔡锷等发动的护国战争，维护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维护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反对复辟封建帝制方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蔡锷作为护国军的主要领导人，在发动和指挥战争的过程中坚决果断，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带病坚持在 frontline 战斗，其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尽管护国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它却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战争虽然打垮了袁世凯，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十一、魂归故里

袁世凯死后，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黎元洪继位当上了大总统，以段祺瑞为国务卿组织新内阁。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军阀各据一方，拥兵自重。蔡锷早就敏锐地预见到，袁世凯死后“争权夺利者，必蜂拥而出”，所以，他于1916年6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各省都督，呼吁他们搁置成见，“收束兵事，保故治安，维持财政”。声明自己俟（Si）局势稍一稳定，将“抽身引退，或避居山林，或游海外”，“终身为一太平百姓”，表现了他洁身自好、正直高尚的气节。这种不为个人谋权夺利的精神，令人钦佩。梁启超认为这是蔡锷“所以与今之军人异者”。

唐继尧与蔡锷的态度截然不同，在护国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之后，他却仍借护国之名，大肆扩军，并加紧了派兵出省的部署。显然，唐继尧打算利用护国战争胜利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实现占领四川的野心。蔡锷对唐继尧的目的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在6月下旬接受四川陈宦的求援，派兵赴成都帮助消灭袁世凯在四川的余孽周骏部，接着致电梁启超，要求按照军务院第十条宣言，撤消护国军军务院，力图遏制唐继尧的军事图谋。

为了缓和南北矛盾，段祺瑞政府于6月24日发布命令，委任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其实，段祺瑞欲以高官显爵笼络蔡锷，实在完全看错了这位为国为民，视爵禄为敝屣的护国将军。战争结束之后，蔡锷的喉病日益加剧，亟需静养。他常常驾舟沿着永宁河缓缓而行，川南的大好景色使他胸怀激荡，写下了著名的《护国岩铭》：

护国之要，惟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
嗟彼袁逆，炎隆耀赫。曾几何时，光沉响绝。

天厌凶残，人诛秽德。叙泸之役，鬼泣神号。

出奇制胜，士勇兵骁。鏖战匝月，逆锋大挠。

河山永定，凯歌声高。勒铭危石，以励同胞。

后来，蔡锷命人将此铭刻于永宁河畔的一块巨石上，作为对护国军的纪念，以激励后人。

7月6日，北京政府又委任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成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急切地恳求蔡锷西上成都。此时，蔡锷正在泸州治病，由于从重庆赶来的德国医生误诊和用药不当，蔡锷的病情陡然加重，不但声音嘶哑、喉部剧痛，而且又开始不规则地发烧，身体越来越虚弱。7月29日，蔡锷乘轿从泸州抵达成都，数万老百姓到40里外的地方夹道欢迎，都想一睹这位护国英雄的风采。全城悬挂国旗，场面十分壮观。蔡锷目睹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声音却一点也发不出来。

四川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地势险要。但由于连年战事不断，元气大伤，已经变得满目疮痍，百姓穷困。蔡锷到成都后，很希望能够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有所作为，然后再请假养病。蔡锷在成都的10天里，大刀阔斧，整顿了在四川的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制订军队、官吏奖惩条例等。他曾经设想在两三年内，以雷霆万钧之力，根除积弊，推行便民养民政策，振兴四川的经济和实力。但是，他的身体却不允许这样，他的病情在成都经过检查之后，确诊为喉头结核，而四川没有良好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四川的气候也不利于治疗。如不尽早离川医治，病情会越来越恶化。

由于病情已经恶化到无法再进行工作，蔡锷只好请求北京政府准予辞职治病，在到成都10天后，蔡锷终于不得不离开成都。在蔡锷离去的那一天，成都人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涌向街头，有人甚至烧着香、拦着路不让他离开。蔡锷被成都人民的深情厚意深深地感动了，他热泪盈眶，心中有千言万语，却只能请人代为致答谢词。他当时撰写的《告别蜀中父老文》，情词真切，动人心弦，为四川人民传诵一时，读者无不感泣。

蔡锷离开成都，在朱德家中休息了几天，然后从泸州改乘轮船，沿长江而下，于8月28日到达上海，与梁启超见面。这时蔡锷病情已经很严重，住在医院，虚弱得连两步都走不了。黄兴获悉蔡锷到上海的消息，立即派儿子黄一鸥代表他前往迎接。9月9日，蔡锷东渡日本，住进福冈大学医院治疗。

10月31日，黄兴突然病逝于上海，蔡锷得知这一消息，悲痛欲绝，哀悼终日，拖着病情日益加重的身子，含着泪亲自写下了一副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这副挽联，竟成了蔡锷绝笔。

1916年11月8日上午4时，年仅34岁的蔡锷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这位叱咤一时的年轻将军临终前，想到的不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而是挂念着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他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又口授随行人员写下了四点遗嘱并致电全国：（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现在各派意见多乖，竞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垦飨（ch@）罗佩金、戴戡，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四）

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蔡锷逝世的噩耗传到国内，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悲痛和哀悼。北京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立即派驻日公使章宗祥前往治丧，决定追赠蔡锷为上将军，并举行国葬典礼。北京政府发出蔡锷的讣告后，北京设立了灵堂，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梁启超闻噩耗后，心情十分悲痛，在上海与旅沪人士举行公祭，手撰祭文伤情至极。

1917年4月12日，蔡锷的国葬典礼在蔡锷的故乡湖南长沙举行，会场上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氛，许多知名人士送去了挽联，其中孙中山先生的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他以班超、马援这两个历史上智勇双全的名将作比喻对蔡锷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颂。

蔡锷的遗体葬于长沙岳麓山万寿寺之后山，北京政府随后又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蔡锷所走过的光辉而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财富，他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凭吊和瞻仰。

